

# 从文化差异看中美关系

王振民<sup>1</sup>, 于一丁<sup>2</sup>

(1 西北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127; 2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北京 100085)

[摘要] 分析了文化差异与认知相符下的中美关系, 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看法, 导致双方存在不信任, 而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也进一步交融、碰撞、冲突; 在中美两国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 应正确认识和理解引起中美之间出现的若干矛盾和冲突的知觉性因素, 发挥大众传媒作用、重视决策者影响力、加强文化交流、构建双方高层定期会晤和重要问题的紧急磋商机制, 从而正确了解认知失调下的中美安全问题超越文化差异, 实现共同发展。

[关键词] 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 美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G 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9)02-0091-06

美国零点调查公司显示, 美国在 1999年和 2004年当选中国居民心中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 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国家。2007年 12月, 美国百人会发布了 2007年中美民意调查简报。民调主要结果也显示: 中美公众与精英都认识到两国关系对彼此的重要性, 在总体上对对方存在好感。但是数据也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视作威胁, 而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的崛起<sup>[1]</sup>。如何认识中美之间出现利益共存却相互憎恨的困境呢? 决策者和国民对两国关系的知觉性因素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因素。就中美关系而言, 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仅事关亚太地区的稳定, 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但是为什么两国关系在发展 30多年后依然充满起伏和波折? 这里面固然有国家性质、国内政治等因素在起作用, 但对作为决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决策者和民众来讲, 他们总受一定文化传统支配下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文化尤其是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世代相传的规则、理念、秩序、信仰, 其对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既能产生因果性的影响也能产生构成性的影响, 其往往是自我证实的预言。它不仅强化人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 而且增强人的知觉所固有特性如倾向性、单向性及选择性, 进而影响民众对对方行为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方所要建构的国家身份、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认同程度。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 如果双方分析或思考某一问题时知觉发生偏差而导致立场对立, 极易引起

双方的误解和冲突, 从而引起两国或民众关系的紧张, 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困扰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权问题等无不与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知觉偏差密切相关。

## 一、文化差异与认知相符下的中美关系

人们对世界上事物的认识虽然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而产生的认识(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怎样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和认识论), 使人们的认知结构趋于相符或平衡。如果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 而且行为体确有理由相信他所知觉的环境中存在相符的现实, 人们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知觉恒常性或认知相符现象。在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或岛国社会中, 影响决策者和国民知觉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sup>[2]</sup>。而这种行为方式则是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的经验教训、本国政治体制在决策者内心里凝聚的结果。如果表现在对曾经发生过的严重影响国家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 比如对战争的认知, 由于不同的文化模式、信念体系、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以及所发生事件的震颤波及效应, 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该国大多数国民的知觉倾向。如果一方决策者长期对重大历史问题含混不清且逃避历史责任, 不仅会使国民意识出现认知封闭现象, 而且还会加剧另一方国民

[收稿日期] 2008-11-26

[作者简介] 王振民(1972-), 男, 陕西澄城人, 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于一丁(1986-), 男, 北京人,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研究生五队。

和决策者对其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强化对对方原有的认知倾向。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这种非理性的知觉恒常性非常牢固,很难在短期得到修正。比如,美国外交政策运转中出现的“邪恶的地理学”现象<sup>[3]</sup>,中国对美国国家本质的固有认知都会强化双方对对方“险恶用心”的判断。

美国是一个缺乏深厚历史文化的现代型国家和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既没有历史骄傲,也没有历史包袱,更没有太多伤心的历史屈辱;同时,在“天命命运”学说的光环下,美国特殊命运和使命的观点在国内几乎受到普遍的支持。这一方面造就了美国文化开放、冒险、创新、独尊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成为美国两个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尤其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民族认同的关键和维系美利坚民族的纽带。无论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一种建立在明确世界观的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套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思想构成,被认为是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好,它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sup>[4]</sup>这种世界观之根基就是深入影响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因为其不仅是基于洛克理念共鸣的,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为名义的美国革命的旗帜,也是美国进行南北战争、扩疆开国创立民主共和体制的理念,成为美国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国的共同文化以及‘美国信念’的两条主要原则,即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是美国的核心文化<sup>[5]</sup>。

自由主义对美国民众和决策者的知觉框架下的中国形象的认知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这种观念体现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对自我的认同的方式上,就是以对对象的镜像式反映为其基本方式。在这一视角下,美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sup>[6]</sup>。美国对“他者”的态度,无论是“征服”,还是“包容”,都必然以建构“他者”为前提<sup>[7]</sup>。美国在文化实践中建构出来的“东方主义”就是其体现。这种话语表露出美国的霸权心态和特殊的优越感。中国即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然被视作需要改造的落后民族国家;二是深化了美国是“山巅之城”、自由之乡、民主的楷模,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理想世界的缩影的心理认知体系,必须确保美国不被“世界化”,而应使世界“美国化”;美国的民主模式、自由社会制度、人权观念理所当然具

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外交的政策唯一的合法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并把它们扩大到其他民族(中国也不例外)<sup>[8]</sup>。三是固化了反共产主义的特征。在美国人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是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将导致自由世界的毁灭和自由的终结。美国只有通过维持自己的自由社会,才能有力地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和所提出的承诺。事实上,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对美国重要的文化价值至少是一种象征性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否真的存在。总统、总统顾问以及被认为对政策有影响的精英们都是在这种文化取向所构造的理论框架内理解国际事务的;而在文化偏见、理论框架已定的情况下,对所有事件的感知和理解都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偏见或理论。无论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只要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制度的正统性,都会成为中国险恶意图的经验主义证明。如果再加上美国大众传媒的渲染,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看法,有意无意地导致双方之间存在的敌意和不信任。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传统型国家。它既有历史的骄傲,也有历史的包袱,更有伤心的历史屈辱。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融合儒、道、佛价值理念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在历次的社会变革和外来文化碰撞糅合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温良、恭俭、中庸、天道的形象,其中的中庸体现出“以和为贵”的文化思想,而天道体现出了“和谐世界”的文化特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髓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sup>[9]</sup>。另一方面,中国以儒家仁义道德为价值信念,以成仁取义为价值理想的思想传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团结互助、亲仁善邻、讲信修睦为特征的价值体系。张岱年先生把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其中“让”的美德、“和”的内核以及勇于开放创新的文化精神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众日常行为的观念定势和思维模式。

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民众和决策者的知觉框架下的中国形象的认知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凸显了“和”的价值取向,把和而不同作为世界价值和谐的精髓,提倡文化多样性、新的安全观,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很多行为,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映在中国人眼里,

美国不仅是一个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经常出尔反尔,毫无信义可言。二是延续了“让”的美德,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世界秩序稳定的基础,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倡导秩序和谐、力量和谐,实现国家共同繁荣。但是由于美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分工、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中国在经贸交往中发生一些贸易摩擦和纠纷的时候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在挤压和排挤中国的生存空间。三是强调了“国权”的重要性,这与美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既是中国“国”、“家”合而为一的基本理念,也是近代中国经验教训在民众和决策者凝聚的结果。2005年,《环球时报》关于“中国人怎么看美国”的调查显示,78.8%的受访者普遍对美国不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持否定态度<sup>[10]</sup>。

当然,中美文化之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人们在比较理性认识中美关系,这对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两国文化都具有开放性。这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这种交往和沟通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的利益分歧。2007年,中美民意调查简报显示:52% - 60%的民众对彼此国家、人民和文化存在大致良好的印象,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两国民众都认同中美贸易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其次是两国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相近。尽管两国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第三是两国民众有着相近的思维方式。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这些使双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用变化的眼光、客观的态度看待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

## 二、认知失调下的中美安全问题

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两国间的安全问题是国家关系良好互动的重要因素;而两国的决策者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如何认识自己的安全境况和安全威胁,会引发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当决策者在考虑采取自己认为可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政策时,总是就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来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并自圆其说,而且认为对方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但如果对方决策者和国民认为受到了实质性伤害,这时受到伤害的一方不仅看到自己受到的伤害,

而且认为伤害自己就是对方的主要目的。同时,他还用这种推理来预测对方未来的行动,断定自己不采取强硬措施,对方还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行为体不正确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当对方采取不利于自己的行动时,他就会断定对方行动背后有着强烈的自生性动机<sup>[11]</sup> 366-367。一方为维护自己根本利益而采取的自然行动,对另一方来说可能就构成了威胁。行为体对对方造成的伤害比自己原来设想的要严重,原因是行为体意识不到它们的政策与对方的利益有着多大的冲突。中美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与知觉在一定程度上与在同一事件中因不同的关注点而导致的诱发定势密切相关。比如,中美两国虽然在如何对待“台独”问题上进行过交流和沟通,但却常常发生冲突和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决策者和国民的知觉框架中,趋向于将遏制“台独”视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关注的中心靠拢,要么帮助自己,要么损害自己。而在美国决策者的知觉倾向中,把中国大陆对“台独”发出的强硬信号理解为一种中国大陆力图改变两岸现状的意图。美国很容易将大陆的行为归于它的国家性质或者战略野心,而不是归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情感。邓小平曾指出,《对台关系法》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在尽老朋友之间的“友谊”罢了。但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sup>[12]</sup>

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敏感程度既与双方共同利益的大小有关,也与双方建构什么样的国家身份的观念以及是否认同对方的国家身份相关联。两国间身份的认同因事件、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也因为自身是双边的、地区的或者全球的身份而有所改变。因而,在主体间相互冲突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行为体倾向于根据能力推断对方的意图。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身份实际上是主流国际社会对一个主权国家性质及其对外行为倾向的认同程度。它是由“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内在结构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关联,外在结构则是“共有观念”,即一种政治文化环境。“共有观念”确定国家之间的敌友身份,如果“共有观念”建构了行为体之间的敌对身份,国家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决策者对对方所要建构的国家身份如果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或失调,决策者会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其结果会导致两国在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因关注对象的不同和历史经验

<sup>1</sup> 其意指伤害对方就是一方政策本身的目的。

而发生错误的知觉,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沟通和调节,则会出现双方不愿看到的敌意螺旋式上升,从而破坏两国关系,激化民众和政府间的敌对情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对国家利益的再思考,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战争冲突和暴力功效的认知对国家身份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从一个革命性的、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逐渐转向与主流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维持现状的国家转变<sup>[13]</sup>。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得生存权、发展权。从认知角度讲,一国能否获得较好的生存权与国内民主政治、领导人的意志和国民的认知倾向有关。中国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六不”的对外策略(不抗旗、不出头、不结盟、不称霸、不对抗、不树敌)以及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的观点,深刻说明了中国维护现状的意图。基于此,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强调经济安全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致力于维护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基本特征的认识,中国领导人也强调主权与领土完整性的重要性,毕竟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没有实现国家统一。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相互敌视、对抗的中美关系”发展到“相互依存、合作共处的中美关系”。这个转变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意味着中国清醒的认识到美国可以在促进和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国并不排斥美国在世界事务上发挥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在美国能够彻底消除对中国敌意和演变思潮和势力的前提下,中国对美国的国际地位表示理解和认同。的确,两国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是无助于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可能使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人的不满情绪增长。对一向主张共同和谐发展的中国来讲,中美之间出现利益共生却矛盾重重的困境是不正常的。在两国实力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存在着敏感的防范戒备的心理,这容易导致双方在如何维护各自安全问题上发生争论并互相攻击。比如 2001 年发生的中美战机相撞事故中,尽管美国国防部向中国国防部打电话,但“谁也不同意进磋商,结果导致事态复杂化”<sup>[14]</sup>。但是,美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表现出来这种理性相符的认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确有理由相信,它所知觉的环境中存在相符的现实——美国没有把中国当作朋友,并且这样的信念体系不仅可以解释美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以及允许陈水扁过境外交的行为,而且能预期同意磋商的结果可能诱发中国民众对

政府的不满。

美国虽然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在全球的霸权存在。从情感上、从文化的传统来讲,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后可能出现的多极化格局。在美国所追求的“普世文化”的背后,显现出了美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广泛性和跨国界性,其典型表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论、“新帝国”论。“在这个帝国内,美国把自己看作是设置标准、决定威胁、运用武力和界定正义的全球角色,”<sup>[15]</sup>把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看作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关键。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国内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从现实主义逻辑出发,视中国为企图改变现状的国家,并对美国在全球霸主地位构成了重大威胁。这种对中国国家身份不认同产生的错误知觉,往往使美国政府、国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两面性的手法。一方面美国在强调同中国有着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强调和中国在双边或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磋商的同时,又在台湾问题、人权等问题上我行我素,不轻易向中国让步。美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希望看到的,但如果美国政治家仅仅希望增强自己国家的“自主性”,却忽视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国民意识和国家身份,那么中国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政治上和逻辑上缺乏判断力、自制力,就会把美国看成一个不知意欲何为的危险国家。中美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出现错误知觉的原因,许多是源于认定对方具有强烈敌意的结果,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于 1949 年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存在着较强的霍布斯文化的成分(霍布斯文化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国家根本利益不断会受到威胁。能动者的身份定位是敌人角色,基本行为模式是不顾一切的保全生命,杀戮或被杀。国际体系内所发生事件的基本特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国家为了生存和竞争,不择手段是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大众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对不断崛起中国的主流认识,是通过把中国作为对欧美的反命题以及前苏联的替身而获得它的存在意义。它们通过强调中美间的差异,不断地制造和宣扬中国威胁论,从而达到强化国民对国家利益认同感和民族优越感的目的,为持续构造、再生产和维持美国的普世利益这个更大的政治目标服务<sup>[16]</sup>。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带有一定的“历史禁锢想象”的现象。尤其是历史的类比很容易遮蔽现实事件中一些不同于历史事件的侧面。正如费正清所言,美国人往往把历史当作“杂货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出‘经验’来证实自己

的观点”。美国之所以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朋友,除了意识形态对立和社会制度差异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美国潜意识里把中国当作了冷战时期的苏联有关。美国的决策者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由于他们不能很好地确定和认同中国的国家身份,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中国国民产生的知觉定势,以至中美之间往往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虚幻不相容利益冲突。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决策者没能从以往历史上所发生的震撼性事件吸取教训来改变他们的知觉阈限。严重的是,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视为敌人,只需要很少的和模棱两可的信息就已经足够了<sup>[21][22]</sup>。这也是为什么在百人会调查结构中,60%和75%美国公众和精英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军力发展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或潜在威胁,而大多中国人不以为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超越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

哈洛韦尔指出,“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于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sup>[17]</sup>怎样使两国的决策者和国民既要做到超越历史事件和文化差异又不背弃历史事实的同时,以更现实的、理性的眼光看待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就显得比较重要。

#### (一)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由于中美民众直接交流和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大部分民众是通过新闻媒体等媒介来认识和了解对方的国家。如果媒体不能以客观、公正的立场,而用有色眼镜去观察、评价甚至歪曲对方,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扭曲事实真相,必然在心理上形成了不利于对方的持久印象。美国的公众媒体仍然是影响美国公众对亚洲(包括中国)看法的重要渠道。但是,在美国的媒体、著作、政策参考资料中,很少能看到中国本土信息源在与中国有关的信息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的信息。在选择使用相关信息时,美国媒体的编辑们与政策资料的编撰者们要考虑本国受众对于国际事务包括中国有限的兴趣及较为狭窄的胃口,同时,他们对于信息来源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可以说,与美国消息在中国媒体上的比重相比,美国媒体中中国消息的比重要小得多;与可以接触英文资料的中国人的数量比,可以阅读有关中文资料的美国人要少得多;就媒体的正面、负面报道的比例来说,中国对美国的正面报道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正面报道。而这种不了解往往会导致差距甚远的判断,而且常使美国公众脱离开中国发展的具体条件、历史特点、现实过程,而用自己的标准与条件来评价中国的社会进步。例如,部分美国人保留着用对文革中国

的认识看待现在的中国。

#### (二)重视决策者的影响力

决策者和政府机构不能将自己的任务、前景和身份与对对方具体的认识和印象捆绑在一起。不然允许这样的人来判断两国之间政策的有效性,无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重大危机来临之时,人们更容易受到国家领导分子选择性知觉的影响。在其意识形态的进攻之下,将自身的依恋情绪投射在领袖身上,以及经由这些领袖而唤起的民族国家符号<sup>[18]</sup>。比如,对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美国政府的态度;“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引起中国人对美国的愤怒和不满。

#### (三)推动更多的文化交流

中美两国虽然文化差异甚大,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产生相互的吸引。两国在文化领域交流具有互补性,这种交流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等方面起到了桥梁和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充分说明,东西方文化可以交流共存、互相借鉴学习、共同繁荣发展。在价值观上,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对立情绪,这是由于对中国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解。2005年,在美国举行的“中国文化节”,美国外交学会驻纽约的亚洲问题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说,举办文化节将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切积极影响。任何这样的活动都有助于呈现一个比过去更加全面完整的中国形象,在华盛顿尤为如此<sup>[19]</sup>。

#### (四)构建双方高层定期会晤和重要问题的紧急磋商机制

从邓小平访美到胡锦涛访美引发的美国人的“中国热”可以看到,这种机制对两国比较好地理解对方的意图和目的很有裨益,起码可以弱化对方冲突的规模和矛盾的深化,不失为校正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的知觉偏差的好方法。在2004年的APEC会议上,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中国领导层和民众对“台独”问题以及美国一些错误认识的鲜明立场,从而使美国决策者明白无误地理解了中国的行为和意图。这促使美国对“台独”势力表明美国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修复了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也要冷静观察中美之间的矛盾,防止不稳定因素的扩散,更要有一个自信、平和的心态。即使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恐惧。邓小平早就表示,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sup>[20]</sup>。我们应立足于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真正做到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美国决策者和国民来讲,既要认识到两国不同历史传统和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的差异性而可能导致的认知的偏差,更要摒弃冷战思维,以理性和现实的眼光对待中美关系。现今的美国政府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美国敌意这一认知倾向本身的代价往往被低估。他们很少考虑到,一个心存疑虑但又不具侵略性的中国要表现出自己的非扩张意图并非易事。总的来说,就中美双方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两国决策者和国民要能够进行移位思考,尽量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文化情境和历史环境的氛围中,来理解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也要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以便防止用习惯性的知觉定势去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努力使对方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认识和对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错误知觉,避免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和对抗。在此情况下,一个面向 21 世纪的良好健康向上的中美关系才是可以真正实现的。

[ 参 考 文 献 ]

[ 1 ] 百人会 2007 年中美民意调查简报 [EB/OL]. [ 2008- 01- 25 ] <http://www.cam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PDF/US-China%20Relations/c100survey.pdf>

[ 2 ] [美]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M]. 秦亚青,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294- 295.

[ 3 ] [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 文化和认同 [M]. 金 焱,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24, 230.

[ 4 ] 王逸舟.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66

[ 5 ] [美]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11.

[ 6 ]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M]. 王振西,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259.

[ 7 ] 任 晓, 沈丁立. 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77- 78

[ 8 ] 周 琪.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1.

[ 9 ] 姜广辉. 中国文化‘协和万邦’思想的基本准则 [N]. 光明日报, 2000- 10- 10.

[ 10 ] 《环球时报》独家调查: 中国人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EB/OL]. [ 2005 - 03 - 02 ] [http://www.ce.cn/xwx/gjss/gdwx/200503/02/t20050302\\_3206395\\_shtm1](http://www.ce.cn/xwx/gjss/gdwx/200503/02/t20050302_3206395_shtm1)

[ 11 ] 王人博.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525.

[ 12 ] 宫 力. 中美关系热点透视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14.

[ 13 ] 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 10- 11.

[ 14 ] 参考消息 [N]. 2004- 12- 10( 1).

[ 15 ]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J].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44

[ 16 ] 郭树勇.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 [M].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1: 120- 121, 190- 191.

[ 17 ] [美]M. E. 斯皮罗. 文化与人性 [M]. 徐 俊,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58

[ 18 ] [英]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 [M]. 冯建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65

[ 19 ] 美报评中国文化节开幕: 华盛顿闪耀中华文化之光 [EB/OL]. [ 2005- 10- 06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 10/06/content\\_358475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 10/06/content_3584753.htm)

[ 20 ]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20

(责任编辑: 冯 蓉)

A Look at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from Cultural Difference

WANG Zhen-min<sup>1</sup>, YU Yiro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The Logistics Comm and Academy,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 under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recognition conformity. The viewpoin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d ideology have led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mistrust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West,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are further intermingled, collided and clashed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re are huge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perceptual factors triggering som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m, to bring into play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ddress the influential power of the policy decision-makers, reinforce the cultural interflow, construct the mechanisms for periodic summit contacts and the emergency consultations on pressing problems between both parties, and then to correctly comprehend that with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recognition, the Sino-American security problem should surpass the cultural disparity to effect the comm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 Chinese culture; American difference